

〈論説〉

雍正帝天下中国观再探

——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

宋 华 政*

摘要：雍正年间所发生的“曾静投书案”，使得由“华夷之别”引起的民族矛盾、清朝统治合法性等问题推到了雍正帝的眼前，雍正帝在与其论争过后，亲自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并颁行天下，作为对民间反对声音的回应和宣告。书中所展现出的雍正帝“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天下中国观，受到后世皇帝的继承与发展，这一观念不仅对于近代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国家版图的维护有着重要意义，在面对“新清史学派”的提问与对答时，也能引发学者新的思考。

关键词：雍正帝；《大义觉迷录》；天下中国观

概要：雍正時代に発生した「曾静投書案」は、「華夷の別」によって引き起こされた民族の矛盾と清王朝の支配の正当性、および雍正帝に押し付けられた他の問題につながりました。曾静と議論した後、雍正帝は自ら「大義覺迷錄」という本を編纂し、人々の反対に対する応答と宣言として全国に広めました。雍正帝の「華夷一家、天下一統」という見解は、後の皇帝にも受け継がれ、発展させられており、これは近代中华民族の形成と国家領土の維持にとって大きな意味を持つだけでなく、「新清史学派」の質問

* 宋华政（1997-），男，汉族，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と回答に直面したときに、学者の間で新たな思考を引き起こすことができます。

キーワード：雍正帝、《大義覺迷錄》、天下中國観

引言

清朝起源于白山黑水之间，自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定鼎中原以来，民间反清复明的叛乱活动便持续不断。究其原因便是中国传统“华夷之别”观念所造成的、士人知识分子对清朝异族统治的不认可，认为“夷狄窃国、得位不正”，清朝统治中国不合正统规矩。加之清朝入关后发生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镇压事件，一时之间，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除了南明抗清斗争以外，台湾明郑势力、西南三藩作乱俱令清朝统治者头痛不已，仅号称“朱三太子”的谋反案，康熙一朝便发生数起。同时，民间谣言四起，毁谤对象皆指向清朝统治者。如吕留良弟子严鸿逵便散布谣言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热河发生洪灾，“淹死满洲人二万余。”¹热河当地各族杂居，严鸿逵却专门强调淹死两万满洲人，其针对性十分明显。顺治、康熙以来，清朝统治者也开始逐渐转变观念，不再一味镇压，而是通过各种怀柔政策，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或是从思想舆论的角度构筑“得天下之正”的理论。²康熙帝不仅大力推行儒学，而且广开博学鸿词科，收揽天下读书人为己所用，提高汉族官员的地位。这些措施虽然有效地缓和了民族矛盾，但是清朝统治者在士人眼中仍带有“夷狄”“蛮夷”“异族”等身份标签。雍正等皇帝深知，必须为清朝的统治树立起合法性，获得天下人对其“正统地位”的认可。而“曾静投书案”的发生恰好为雍正帝提供了一个契机，向天下人宣告清政府官方对华夷问题的看法，于此案诞生的《大義覺迷錄》便

1 《清世宗实录》卷八二，雍正七年六月丙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5页，版本下同。

2 从康熙皇帝开始，便在《孝陵神功圣德碑》及康熙五十六年发表的长篇《面谕》等文字中不断强调“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观点，详情可参见姚念慈的《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一书。

体现了雍正帝本人的天下中国观。

关于《大义觉迷录》中体现出的雍正帝天下中国观、对民族关系态度，学术界历来有人对此研究，成果颇多。³除了国内学者，日本学界如小野川秀美、伊东贵之等也较早地注意到了《大义觉迷录》，并分析其与雍正帝之间的关系等问题。⁴欧美汉学家中对此问题最为关切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他在还原“曾静投书案”始末的基础上，认为这一案件不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处理民族矛盾问题从以往的武力镇压转为思想教化，而且雍正、乾隆父子二人在处理此案时态度的差异表现了满族统治者在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发生了转折，清朝开始从认同接纳汉文化的优越性转向强化肯定满人的自我认同意识。⁵虽然当前学术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已基本成熟，但是，面对西方史学界所兴起的“新清史”热潮，我们仍有必要对

3 目前学界有关《大义觉迷录》中所见雍正帝华夷观、天下观等政治思想的研究有：何晓芳《论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及其民族思想》（《满族研究》1986年第2期）、吴洪琳《试论雍正帝的民族思想——〈大义觉迷录〉新解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栾洋、姜胜南《帝王眼中的华夷之分与君臣之伦——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政治思想》（《燕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衣长春《帝王眼中的华夷之分与君臣之伦——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政治思想》（《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衣长春《论雍正帝边疆民族“大一统”观及政治实践》（《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陈文祥《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华夷观》（《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尤学工《清初官方与明遗民历史观念的冲突与调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张姗《“包容”与“局限”——论雍正帝民族观念的双重性》（《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此外，王汎森也借《大义觉迷录》来分析从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华夷观从雍正强调自身虽为“外夷”却因“有德”而承天命，到乾隆不再提及自己“外夷”身份的转变，《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1-324页。而近年来，尤以杨念群的著作引人注目，《大义觉迷录》成为其论述清朝大一统建构过程的重要文献之一（《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4 （日）小野川秀美：《雍正帝と大義覺迷錄》，《東洋史研究》1958年第16卷第4号；伊奈貴之：《清初期における「秩序」構想とその蹉跌：呂留良思想再考》，東京大学1996年博士学位論文。

5 史景迁的这部作品 *Treason by the Book* 于2001年问世，随后由邱辛晔译为中译本——《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于2005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17年，该书被温洽溢、吴家恒重新翻译，以《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为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

此问题进行温故。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所表达出的天下中国观，代表了当时清朝官方对于民族、疆域以及自我身份问题的看法，而这正是对当前“新清史”研究中某些问题的回应和解答。⁶所以，《大义觉迷录》所体现的雍正帝天下中国观问题依然有进行研究的价值和必要。

一、中国古代华夷之别观念

中国古代的“华夷之别”观念萌发于先秦时期人们对天下九州、五服的地理认知。无论是《尚书·禹贡》中的“九州”或是《国语·周语》中的“五服”，都是一种分割天下、地分远近的地理空间认知。在古人的天下观念中，地有远近、人分华夷，距离中心越远的地带，越是荒芜，那里生活的人也就越加野蛮，被称作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是基于自身文明程度所产生的一种优越感，和对边远地区的想象。由于千年以来，除了佛教，中国鲜少受到外来文明的巨大挑战，中国自身的文明程度在较长的时间段里，一直处于自我认知范围内的中心地位。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之一便是华夷之别的天下观，自己所在之处便是天下的中心，华夏之外皆为夷狄。直到明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这种传统的天下观才随着认知范围的扩大而开始转变，但是它对于传统中国施加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一时之间难以消弭。⁷

6 新清史论争的起源便是罗友枝 (Evelyn S. Rawski) 在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 Nov., 1996) 一文中针对何炳棣在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 1967) 中所持的清朝“汉化”观点表示质疑而展开争论。新清史主要的关注点就包括清朝统治者对民族关系的处理、对边疆的统治、对“中国”的认同、华夷之间的融合等。《大义觉迷录》所代表的雍正帝的态度恰好涉及了其中一些问题的回应和例证，所以也受到了新清史学者的关注，从多种角度对其解读。例如，美国的濮德培 (Peter C. Perdue)，在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书中便从满族主体的立场出发，分析《大义觉迷录》中所讨论的“天下一统”与“华夷之别”，认为二者是相悖的：既然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天下观便是崇尚“大一统”，那么又何来的华夷之别呢？令人产生新的启发。

7 详情可参见葛兆光：《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第一章《世界观：从古代中国的“天下”到现代世界的“万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56

正是由于这种士人坚称的华夷之别观念，所以，自清朝入关定鼎中原以来，反清复明的叛乱活动时常发生，其秉持的理论基础便是吕留良⁸等人所称“夷狄乘虚，窃取神器”这种得位不正的观点，本质也就是“华夷之别”。基于这种理念，传统的士人、知识分子认为凡是异族称帝，便是“窃国”，非中华正统。在“华夷之别”观念盛行和反清活动持续不断的背景下，顺、康、雍三代皇帝均希望证明清朝的正统地位、得国之正。终于，这种“华夷之别”的矛盾冲突在雍正朝点燃了一个导火索，使得雍正皇帝找到了机会来批驳“华夷之别”观，证明清朝的正统地位，这个导火索就是“曾静投书案”。

二、“曾静投书案”始末

曾静（1679年—1741年），湖南靖州人，因屡试不第便回乡设私塾教书，生活贫寒，所以对清朝统治心怀不满。后曾静结交了已逝浙江学者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再传弟子沈在宽等人，接触到了吕留良遗书中所含的“夷狄窃国”等反清思想，便以此来抨击雍正帝及清朝统治。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儒生曾静派弟子张熙赴陕西，向时任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的岳钟琪投递策反书信，书中所言尽是“大逆不道”之语，“诋毁天朝，言极悖乱”，简直是“丧心病狂，狼嗥犬吠”，⁹历数雍正谋父、逼母、杀害兄弟、贪财好色、残暴为政、杀害忠良、亲近小人等十大罪状，质疑其道德品行和继位合法性，甚至进一步提出“华夷之辩大于君臣之伦”，否定清朝统治合法性，并宣称岳钟琪作为“宋武穆王岳飞后裔”，应该继承先祖之遗志，趁“握重兵、据要地”之良机，“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意

页。

8 吕留良（1629年—1683年），浙江崇德人，清代理学家、思想家，曾参与南明抗清武装活动，失败后回乡钻研程朱理学。在与黄宗羲结识后，其思想受到影响，带有反清民族主义色彩。

9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533页。

图鼓动其反清，光复汉人基业。¹⁰

岳钟琪看完书信大惊失色，立即扣押张熙，并派人请来按察使硕色、陕西巡抚西琳一同前来旁听，以作见证。原本岳钟琪手握重兵、武功卓著，已引起了朝野上下对其反清的猜疑，岳钟琪便借机向雍正帝汇报此案以表明忠心。雍正帝对其忠心给予肯定并授意他假意与张熙结拜，引诱其供出曾静，再将曾静抓拿归案。

鉴于“曾静投书案”涉及到雍正帝本人的名誉以及清朝的统治合法性问题，雍正帝对此十分重视，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情来处理此案。他派遣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同湖南巡抚王国栋到长沙会审曾静，曾静对本人一手策划投书一事供认不讳，并将与吕留良弟子结交等事和盘托出。于是，雍正帝命浙江总督李卫缉拿吕留良后人与严鸿逵、沈在宽等，“将吕留良、吕葆中剖尸梟示，伊子吕毅中斩决。其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暨钞录者，尽行燔燬之”，¹¹将吕留良书作全部查抄销毁。《清世宗实录》中对此案经过所载甚详，不再赘述。¹²

但是，雍正帝赦免了首犯曾静与张熙，面对曾静所撰《知新录》中所宣称的“华夷之别”等“大逆不道”言论，雍正帝甚至以皇帝之身份亲自审讯曾静，借此时机与其展开论辩，对其观点加以批驳，以消弭民间流传的种种于己不利的言论，肃清流言。之后，他又将论辩过程和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书，刊布天下进行宣教，使士人接受其“华夷一家，天下一统”观点，缓和民族矛盾、消解反清份子的仇怨。因其警醒世人、宣教文治之用，此书命名《大义觉迷录》。

10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第533页。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二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7页。版本下同。

12 《清世宗实录》，卷八一，雍正七年五月乙丑，第72-73页。

三、《大义觉迷录》其书

按文献学家黄永年介绍，“此录清世宗为曾静一案所作，由武英殿刊印颁行，并赦曾静及其学生张熙之罪，至高宗即位复诛杀曾、张，收缴此录，此录遂成罕见珍籍，至清季乃复铅印以作反清宣传之用。”¹³《大义觉迷录》一书是雍正帝借“曾静投书案”所作，内容包括雍正帝的上谕十道、审讯词、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最后又附上了曾静被雍正帝“开导”后忏悔认罪の《归仁说》一篇，全书共计四卷。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雍正帝在上谕中针对“华夷之别”“夷狄窃国”等反清言论做出的回应和反击，对污蔑自己的所谓“罪状”的自我辩解，杭奕禄、王国栋等人审讯曾静及其招供认罪的过程等。

《大义觉迷录》一书当时由武英殿刊行，雍正帝明令要求“通行颁布天下各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¹⁴在中央，先印制一批分发“在京师院大小衙门满汉堂官每员一部，司官每司一部，翰詹科道每员一部，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各都统衙门每处二部，护军统领步军统领衙门各一部，每旗佐领各一部，官学义学等处各一部，五城兵马司、顺天府宛大二县及顺天府儒学，共给五百部”，其次，是“马兰峪总理事务处一部，总兵官一部，盛京各部衙门一部，各司一部，奉天府尹府丞各一部，儒学二部，奉天、宁古塔、黑龙江将军各十部”，“令各该管官员随时宣谕，俾兵弁士民咸共知悉，倘有遗漏怠忽者，定严加议处”，地方上，则“在外各省督、抚、将军、总河、总漕、提、镇、藩、臬、学政、观风整俗使、巡察御史、巡盐御史、织造各一部收贮各该衙门，仍着各该督抚照例颁发原本另行刊刻分给各属，令府州县官查明在城及各村镇需用之数，并儒学教官应给诸生若干，俱行遍给。其绅士中有愿刷印者，许其刷印”。¹⁵此外，雍正帝还要求“各省

13 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第一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

14 《大义觉迷录》卷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页。版本下同。

15 《福建漳州总兵官初有德揭报领到〈大义觉迷录〉》，雍正八年七月初四日，张伟仁主

督抚等官着照所议每人各给一部，再发一部与该省刻印之衙门，令其照此正板刊刻，务期速成通行颁发，不得迟延。京师刻成之书，各省总督巡抚着每处再各发一百部”。¹⁶假若某地“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¹⁷如此，便保证了全国上下均能及时学习到此书。而雍正帝还在“曾静投书案”后命湖南等地设“观风整俗使”，将曾静放归湖南，结合《大义觉迷录》宣扬“清朝得国之正”，“当今圣上仁德”。一时之间，此书遍及天下，相当流行。据估算，此书当时发行量达到了三十万至五十万册之间。¹⁸

而乾隆帝继位后却又一反前朝政策，对此书大加查禁，一时之间竟成为了“禁书”，但是，经过雍正帝的大力推行与严令宣谕，在如此广泛的流传度下，此书终究未能被彻底抹除。数十年后，仍有江西巡抚海成、浙江巡抚三宝、云贵总督李侍尧、署云贵总督裴宗锡等人陆续奏报查获《大义觉迷录》，认为“是从前收缴之时尚多未尽”，“实难保无余剩”，只能“饬属加意收查，不敢称懈”。¹⁹

本书当中收录的雍正帝关于曾静案的上谕虽然散见于《清世宗实录》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代汉文谕旨等文献中，但是书中的《归仁说》、曾静的口供、审讯词及雍正帝的自我辩解等内容仅见于此，尤其是本书由雍正帝亲自删改、官方发布，从中更能看出雍正帝本人对此案以及曾静反清言论的态度，在面对“华夷之别”观念时，如何评析其本人的天下中国观，此书独具重要的史料价值。

编：《明清档案》第4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第A44-83（5-2、5-3），B25220-25221页。

16 《福建漳州总兵官初有德揭报领到〈大义觉迷录〉》，雍正八年七月初四日，第A44-83（5-1），B26219页。

17 《大义觉迷录》卷1，第9页。

18 高学蛟：《〈大义觉迷录〉的文本流播与记忆再现》，《清史研究》2022年第5期，第72页。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48、625、809、822页。

四、雍正帝天下中国观

在与曾静论辩的过程中，双方聚焦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道德败坏、得位不正问题；二是华夷之别及清朝统治者作为夷狄入主中原，其统治地位合法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到雍正继位过程及其自身道德品性，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雍正帝本人的天下中国观主要体现在他与曾静论辩的第二个问题上。关于第二个问题，双方分歧又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

（一）华夷之间是否存在区别？区别何在？

曾静在《知新录》中言：“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²⁰“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运转与禽兽无异。”²¹曾静认为，人与“夷狄”之主要区别在于空间地域上距离中原地区的远近。但是，曾静自己又声称“天下一家，万物同源”，²²这明显是自相矛盾，既然天下一家，万物同源，那么又何来的华夷之别呢？雍正帝抓住这一逻辑上的巨大漏洞对其大加批判。对于地域分华夷的观点，雍正帝援引儒家经典“《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²³对其驳斥，“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²⁴中华与“夷狄”所面对的是同一个天地，万物孕育在同一天地之下，夷狄难道不在其中？雍正运用儒家《中庸》的“天下一体”理论反驳曾静地域差别的理论。

接着，雍正又举儒家经典《孟子》中的观点：“《孟子》云：‘舜，东夷之

20 《大义觉迷录》卷1《奉旨讯问曾静口供十三条》，第27页。

21 《大义觉迷录》卷2《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55页。

22 《大义觉迷录》卷2《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55页。

23 《大义觉迷录》卷2《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55页。

24 《大义觉迷录》卷2《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55页。

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²⁵认为按此理论，则华、夷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当今籍贯方面的区别罢了，舜和文王也是东夷、西夷之人，难道这就影响了他们的德行吗？曾静对此也只得认同道“岂知华夷之分，圣人原不在地上论，若以地论，则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峡周，西夷之人也，都不通了。将谓大舜与文王不是人，可乎？且更不是圣人，可乎？况由舜、文以下，不知更有几多行为师表，道高百世，如周子、张子、陈良者，俱生于四裔之地，犹历历可数指者乎！”²⁶若曾静继续坚持以地域区分华夷的观点，那么儒家先贤中将不乏夷狄者，不可再称“先贤”“圣人”，天下士人所习诗书便为夷狄之言论，自己也就失去了理论支撑。况且，“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兮獯豸，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²⁷客观上，清王朝疆域的扩大，将前代视为边远之境的地方有效地纳入了统治范围内，且成为了帝国疆域的核心地带。从这一角度来说，以地域区分华夷的观点也是存在问题、不合时宜的。

但是，雍正帝依然认为华夷之间确有差异，只不过这种区别不在于曾静等汉人知识分子所认为的地域差异，而在于是否具有道德伦理，是否接受文明教化。“盖以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故谓之夷狄。”²⁸曾静在以地域区分华夷的观点被驳倒后，只得表示“妄意以地之远近分华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恶分华夷。”²⁹，认同“况夷狄本是论人，亦善恶五性克全，无所亏欠为人；五性浊杂，不忠不信为夷狄”³⁰的观点。

这种以文化区分华夷的观点，为后面论证清王朝正统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25 《大义觉迷录》卷1，第22页。

26 《大义觉迷录》卷2《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53页。

27 《大义觉迷录》卷1，第5页。

28 《大义觉迷录》卷1《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28页。

29 《大义觉迷录》卷1《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28页。

30 《大义觉迷录》卷1《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29页。

（二）清朝入主中原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华夷之别的观念是否可以用来质疑清朝的统治合法性？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便有从“内中华而外夷狄”的华夷观所延伸出的“正统观”。正因有了“华夷之别”的观念，才诞生出了“尊王攘夷”的观念，也就由此开始探讨何者为“王”、天命王权等问题。自秦汉大一统以来，历朝统治者都注重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正名。清王朝统治者的出身之地，已是不争的事实，“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³¹，雍正帝等清朝统治者也不讳言自己为“夷”的特殊身份。但是，是华或是夷，并不能作为评判统治地位合法性的标准。雍正帝认为，“中国之人，既有行习类乎夷狄者，然则夷狄之人，岂无行同圣人者乎？”³²，出身之地不可改，但是德行礼仪却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进行弥补，即由“夷”转变为“华”，夷狄之中，同样可以有行为如同圣人者。既然华、夷之间并非有绝对的对立，那么满族同样可以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同样有资格可以统治天下，只要有德者，便可以成为天下君主。

曾静《知新录》中称，“慨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覆，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³³，曾静等反清份子素来认为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为夷狄窃国，得位不正，顺、康、雍三代皇帝也一直设法证明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借助曾静案提供的契机，雍正帝通过与曾静的论辩，将证明自身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广播于天下，为己正名，堵悠悠众口。

除了统治合法性以外，《大义觉迷录》还涉及到华夷身份与君臣关系之间的张力问题。曾静在《知新录》中宣称，“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³⁴认为华夷之别大于君臣之分，是前提与先决条件，华夏与夷狄之间不构成君臣伦理关系。雍正帝则利用儒家的纲常伦理观对其反击，“君臣为五伦之首，断

31 《大义觉迷录》卷1，第22页。

32 《大义觉迷录》卷2《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64页。

33 《大义觉迷录》卷1《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22页。

34 《大义觉迷录》卷2《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52-53页。

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³⁵又将包括君臣之伦在内的“五伦”纲常视为人所应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而既然曾静等人连儒家所推崇的“五伦”都不具备，又有何资格继续鼓吹华夷之别、夷狄窃国，也就失去了基本的道德立场。雍正在其后的“正统地位”论辩中便占据了主动地位，从三个步骤对曾静的言论进行分反击：

首先，清朝入主中原之前，其身份是明代的邻国，双方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等关系并非君臣之统属关系，而朱元璋作为元朝的子民推翻元朝，才是违背君臣之礼的悖逆之举，“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³⁶，若论清朝是篡夺，实则明朝建立更近似于篡夺之举。

其次，明朝并非亡于清朝，而是在自己的腐败统治下亡于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前明之亡国，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与我朝毫无干涉。自有明之季，政教不修，纲纪废弛。内则盗贼纷起，李自成等扰乱残虐，沦陷京师；外则边警时闻，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是蹂躏中国，消耗明之元气，非独本朝”³⁷，当是时，“李自成已陷北京，明愍帝殉国而死，明祚已绝，明位已移，始请兵我朝来除寇乱”³⁸，明朝国祚已经终结，天命转移，清朝是应请兵入关之名，来协助扫清贼寇，继而登基，统御天下。而清朝扫清李自成势力，“是以我世祖皇帝君临万邦，廓清群寇，救亿万臣民于水火之中，为明朝报仇雪耻。是我朝深有德于前明，显然著明，可自万世者也”³⁹，不仅救百姓免于战乱荼毒，而且为明朝报仇雪耻，于明朝有恩，前明遗民反而应当对清朝心怀感激。

再者，自清朝入关以来，“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⁴⁰，册封明朝皇帝之子孙后代，并且，“今

35 《大义觉迷录》卷2《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53页。

36 《大义觉迷录》卷1，第6页。

37 《大义觉迷录》卷1《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34页。

38 《大义觉迷录》卷1《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34页。

39 《大义觉迷录》卷1《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35页。

40 《大义觉迷录》卷1，第6页。

昌平诸陵，禁止樵采，设户看守，每岁遣官致祭。圣祖屡次南巡，皆亲谒孝陵奠醑，实自古所未有之盛典。朕又继承圣志，封明后以侯爵，许其致祭明代陵寝”⁴¹，不仅准明朝皇帝与藩王的子嗣后代祭拜明帝陵寝，康熙亦曾亲往祭拜，优待明朝的礼典，前明遗民更应对其感恩戴德。清朝得位名正言顺，现在吕留良、曾静等散布华夷之别、夷狄窃国等错谬言论，不仅是污蔑清朝，同样是属于与明有仇。

雍正帝的这番言论明显有为自我辩解的意味，并且明清易代之原因，天下自有公论，所以，雍正帝又摆出了“有德者居之”的理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此外，雍正帝又以儒家经典《书》中的理论进一步批驳，“《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乎，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⁴²，按照儒家先贤之言，天命有德之人为君主，百姓也会归顺有德之人，怎能凭借地域差别来选择君主呢？况且自清朝入关以来，顺、康、雍三代帝王勤勉治世、开拓基业，“在昔汉、唐、宋极治之时，不过承平二三十年，未有久安长治如今日者。百姓自韶皀之年，至于白首，不见兵革，父母妻子家室完聚，此非朝廷清明庶绩咸熙之所致乎？”⁴³即便与通常所称颂的汉、唐、宋等前代太平盛世相比，直到雍正正在位之时，清朝的统治也可称得上是成功的，百姓享太平盛世，离不开三代皇帝的努力，据此可称清代统治者是有德之君，即使是曾静等人所言“谋父弑母”的雍正帝，也为自己辩白，声称自己“即位以后，早夜忧劳，无刻不以闾阎为念”⁴⁴，励精图治，消解外界对自己的负面评价，为自己构建一个有德明君的形象。

同时，雍正帝又回击一言，“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

41 《大义觉迷录》卷1，第23页。

42 《大义觉迷录》卷1，第3页。

43 《大义觉迷录》卷1，第22页。

44 《大义觉迷录》卷1，第22页。

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⁴⁵ 吕留良等人既然声称夷狄犹如禽兽，那么如今满人获得天命授权以统治天下，岂不是表明中国人连禽兽都不如？这种言论无疑是自取其辱。

雍正帝的华夷观念和正统理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华夷之间仅有文化上的区别，且这种区别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进行消弭，华夷身份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夷狄窃国”的理论便不成立，既然是华是夷不能作为区分正统的判断标准，那么就应该以一种新的标准来判断，即君主是否有德，并重新思考华夷之间的关系。依照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所宣称的言论来看，他的天下中国观可以被概括为“华夷一家、天下一统”。

雍正帝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来自于其现实的统治需要。雍正帝时期的清朝，经过康熙时期平三藩、收台湾、征准噶尔等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武功，疆域辽阔，境内各民族混杂。虽然尚未达到乾隆全盛时期的版图，但是也非前代所能比拟。仅与先前的明朝相对比，雍正时期便已将蒙古地区纳入统治范围，并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掌控。所以，这一时期的清朝皇帝面对的是一个疆域极大扩展的帝国，先前可称作极远之地的边疆在此时甚至成为清朝的核心统治地区。伴随着疆域扩大所带来的，是这些周边地带的少数民族亦成为了皇帝的子民、帝国的一份子。此时若再坚称华夷之别，不仅会影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会激化本就紧张的民族矛盾，增加国内的不安定因素。所以，在此现实的统治需要下，雍正帝亟需通过这种“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天下中国观来缓解民族矛盾，增强百姓对自己统治地位的支持，收拢民心。

事实上，雍正帝也确实按照自己的这一理论进行实践。例如，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帝派遣年羹尧前往西北平叛，于雍正二年（1724年）将其击溃。雍正十一年（1733）又将噶尔丹策零的叛乱镇压。这些行为都是在维护清朝的国家统一。再者，“曾静投书案”最后，雍正帝也并未像处理吕留良及其亲友一般，处死曾静、张熙，而是命“尔（杭奕禄）带领曾静由

45 《大义觉迷录》卷1，第5页。

江宁、苏州至杭州，由杭州差人将曾静送至湖南巡抚衙门，由湖南巡抚衙门令伊回家料理家务，毕后着伊自行到观风整俗使李岳衡门听用。如伊欲他往观风整俗使，任其他往，不必阻留”⁴⁶，给予二人相当大的自由度，命其前往江南一带，四处宣讲《大义觉迷录》。难以想象，一个身背谋反之罪的人，可以自由活动至此。虽然雍正帝所给出的理由是曾静的反清言论来自于道听途说的流言，而且只是污蔑了自己，并未辱没先皇，并且这种罪孽深重之人后世也不会再有，更不必考虑杀一儆百，所以，曾静的罪责较吕留良而言更轻，不必严惩。⁴⁷雍正虽百般寻找借口，以在百官面前放过曾静，实则也是希望借此让其在民间宣讲，让士人百姓了解到自己的想法，体现其宽容大度，塑造圣明君主形象，以此缓和先前因华夷之别观念所引起的民族矛盾，消除于己不利的各类流言。

不仅是在曾静案中，即使是在其它场合，雍正帝也透露出对“天下一统”模式的推崇与坚持。例如，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面对陆生楠倡议封建制之时，对其驳斥道：“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禀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⁴⁸雍正帝自得于清朝实现了华夏地区与边疆地区的一统，是前所未有的盛世基业，应当竭力维持，巩固疆域的完整和稳定，至于封建制，不过是上古时代的无可奈何之计，当下已非当年，没有必要再以此保证对疆域的统治。

在这一系列的言论中可以看到，清朝统治者坦然承认自己的满人身份，不断地进行自我身份认同，这不仅包括认同自己的大清政权，也在形成对大一统“中国”的认同。随着疆域的扩张和各民族的融入，这种“大清认同”和“中国认同”逐渐重叠并趋向同一。⁴⁹雍正帝的“华夷一家、天下一统”

4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二册），第51页。

47 《清世宗实录》卷八一，雍正七年五月乙丑，第75页；卷八七，雍正七年十月丁未，第160页。

48 《清世宗实录》卷八三，雍正七年七月丙午，第99页。

49 详情可参考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黄兴涛：《清

理论便是一种抛开了狭隘的民族和地域限制，冲破“汉族中心主义”，从整体来对待“中国”的思想，这不仅有助于缓和华夷之别所带来的民族矛盾，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构建理论支撑，而且为清末从“华夷二元对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做了准备。

结语

乾隆帝继位后，一反雍正帝的政策，不仅将曾静、张熙处以凌迟，更下令全国禁绝《大义觉迷录》。虽然乾隆帝声称先皇对吕留良、曾静处理方法不同，是出于“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的考量，彰显了先皇的宽容大度，不过，如今自己继位，便需要循先例，追究诽谤先皇之罪，重新处理此案。“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洩臣民之公愤。”⁵⁰当然，这只是乾隆帝的借口罢了。究其原因，是在于乾隆帝深知，书中所包含的宫廷斗争等内容关乎皇家尊严，不可流入民间，且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存在，本身便不可受到平民百姓的质疑和污蔑，更何况还与其展开论争，反而会引起民间的无限遐想，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处于维护皇家地位和名誉的角度考虑，即使是悖先皇旨意，也必须要对其查禁。而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帝深知“华夷之别”不可反复强调与提及，留此书在世反而会形成社会记忆，使民众反复记起统治者身份的敏感与特殊，反复讨论曾经意图谋反的吕留良、曾静等人，以及遭受毁谤的雍正帝。为使“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观念成为默认的共识，乾隆帝便采取了较之雍正更为内敛、保守的方法，将《大义觉迷录》收缴销毁，建立起严密的文网。

但是，《大义觉迷录》中所展现出的雍正帝“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天下中国观，已然被后世清朝皇帝认可与继承。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后，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随后也一直在维持这一国家形态的稳

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50 《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癸酉，第216页。

定，调适不同民族间的矛盾。“满、汉均为朕之臣工，则均为朕之股肱耳目，本属一体，休戚相关。至于用人之际，量能授职，唯酌其人、地之相宜，更不宜存满、汉之成见。”⁵¹直至清朝灭亡，溥仪颁布《清帝逊位诏书》时，在其中宣告“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⁵²，坚持五族一体，合为中华，也没有如前代一般再强调王朝鼎革中的“正统”“华夷”而是认为从清朝到民国是“人心所向”的选择、国体的让渡。“《逊位诏书》中已全无‘华—夷’优劣之观念，而惟余为君者均需正视之民心向背、大公无私、五族一体、中华一家等超越性政治价值。”⁵³这种天下中国观的嬗变，或许正如当代学者所思考的一般，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汉化论”，也不同于“新清史”所主张的“满族主体观”，而是一种糅合两种路径的“华化”道路。无论是满族抑或是汉族，在“大一统”中国观念下，清帝国的每一份子都在向着“中华民族”这一共同方向交融，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流，进行民族多元共同体的构建。⁵⁴从《大义觉迷录》中所窥探到的雍正帝天下中国观开始，这种流传百年的“华夷一家、天下一统”观念，不仅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版图完整以及促进中华民族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即使是在面对当下“新清史学派”所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时，也能有新的启发与思考。

51 《清高宗实录》卷八，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辛未，第303页。

52 《宣统政记》卷七〇，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第1293页。

53 韩东育：《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从〈大义觉迷录〉到〈清帝逊位诏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

54 杨念群：《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